

廖仲恺精神遗产的主要内涵与现实意义

周 兴 梁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州 510275)

摘要:廖仲恺一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的精神遗产包涵了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及勤政与廉洁高尚品德等丰富内容。借鉴、继承和弘扬它,对祖国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廖仲恺;精神遗产;内涵;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4-0102-08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离开我们整整80年了。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直纪念与缅怀他的丰功伟业。这不仅因为廖先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建树了不朽勋业,而且更由于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直在鼓舞和激励人们前进。廖仲恺精神内涵极为丰富,可以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概括,我认为,主要包含救国拯民的爱国革命精神、强国富民的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以及勤政为民与廉洁奉公的品质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继承和弘扬。

一 爱国主义是廖仲恺精神遗产之核心部分,应当继承弘扬

爱国主义赤诚是廖仲恺精神遗产的核心内容。在近代中国,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奋进的原动力,曾激励过大批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不息。廖仲恺就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践履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光辉的一生。

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与特色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海外赤子的廖仲恺,其爱国爱乡的思想

产生较早,其青少年时期从家教与儒学中开始懂得爱国的含义和必要性,认识到热爱祖国就要努力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和尽力为乡邦服务。良好的家庭教育无疑是他爱国思想萌发的土壤。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曾任职于旧金山汇丰银行,是当地一位很有社会地位的华侨。他一向关心桑梓、热爱乡邦,在生活习俗上始终保持着中国士绅固有的传统。“其教子辄以国学为先”^[1],经常训勉仲恺要爱国、要努力学好中国文化。廖竹宾常对儿子说:“祖国是每个人的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像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就像爱护我们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2]他又说:“要爱护祖国,第一条件就是不要忘记祖国的文字”,“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读通”^{[2][3]}⁵¹。为此,他安排少年的仲恺每天到华人开办的国学专馆去学习古文与唐诗。可以说,家庭教育及儒家文化的启蒙作用,对当年的廖仲恺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它使廖仲恺知道了学好中国文化的重要性。16岁的他因父亲病亡回到国内后,曾一度在叔父的督导下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从而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我们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周兴梁(1944—),男,江西赣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与人物。

从其《双清词草》诗词中,可见其古文造诣颇深。二是它使廖仲恺从小就懂得了爱国爱乡的含义,使其认识到爱国必自爱家乡始。他民初从政任职于广州时,立志要建设广东为模范省。1924年4月,他又设立、改造惠州同乡会,计划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出力,以惠济民众,充分体现了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第二,廖仲恺的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产物,当时深重民族危机的刺激是其爱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他的爱国主义一开始就同忧国忧民和立志投身救亡联在一起。从爱国走向革命,毕生为革命救国事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构成其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廖仲恺的爱国主义始终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斗争的主旋律相合拍。他从1903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起,尤其是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旗帜下的一员革命战将之后,毕生以革命救国为职志。他先后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斗争和国民革命运动,20多年一直紧随孙中山的鞍前马后,成为其革命战友和得力助手,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可以说,廖仲恺的一生是爱国、革命、奋斗和不断前进的一生。

爱国主义是廖仲恺具有坚定革命信仰和百折不挠奋斗精神的原动力。他一生干的革命工作,始终都与爱国和救国紧密相联系,并总是以此为出发点。廖仲恺之所以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起,能始终服膺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未改变过信仰,是因为他坚信“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也”,三民主义为国家谋、为人民谋,是指导国民革命的唯一南针;“三民主义能得实行,方算是革命成功”^{[4]238},国家才可独立富强。廖仲恺之所以能20余年如一日地先后大力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且不避艰险地主持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因为他深知“党事较一切为重”,党是进行救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改革国事……必须吾党努力作大准备,始有成功希望”^{[5]588,590}。廖仲恺之所以能勇往直前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因为他懂得“帝国主义之侵略实为万恶之源”,满清政府投降卖国,军阀武人总是与列强狼狈为奸助长内乱,因此我们进行“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4]192,250-251},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为国家争自

由与独立”^{[5]862}。廖仲恺之所以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救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革命的作用,一面是除旧,一面是布新”,对处在新陈代谢、走向进步的近代中国来说,“革命就是他求活的路子”^{[4]272,63},“吾人要救中国,必须实行国民革命”^{[6]331,335}。廖仲恺的这些正确认识显然是其行动的先导,正是炽热与赤诚的爱国主义,促使他成为一位毕生献身国事、顽强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爱国职业革命家。

第三,廖仲恺爱国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振兴中华,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近代化强国,以便造福国民和全人类。他的爱国主义将爱国爱民与实现中国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并强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振兴中华与建设中国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他的这种爱国主义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广大人民的需求。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加上清廷封建专制及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近代中国处在贫弱落后、民穷财尽之境,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饱受列强侵袭的状况,廖仲恺明确提出“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制定“远大的计划,按照既定的方针彻底做去”^{[4]63-64},逐步将祖国建成一个国强民富的新国家。他认为,中国只要摆脱了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注意开发富源和发展生产,就完全可以建成一个深固邦本、强国富民、赶超欧美的近代化强国。“我们的民国是在这新时代里的新国。这‘新’的意味……不但是精神的新,并且是物质的新”,只要我们“努力去弄一个新建设,那时中国的新,不要说是欧洲的旧国家比不上我们的,就是最新的美国也不见得比得上我们”^{[4]17}。在此,廖把建成近代化中国作为御侮图强、进而赶超欧美各国的问题提了出来,充满了对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责任感和对国家富强的渴望追求,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

将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探求与向往接受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潮连在一起,这是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他在这点上超越了本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极为难能可贵。廖同孙中山一样,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早开始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探索的杰出代表人物。众所周知,孙从1903年开始就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诩为社会主义,并自称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廖仲恺作为孙的追随者,从1905年起先后在同盟会的《民报》上发表过8

篇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译作,为掀起中国早期宣传“社会主义热”出了大力。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开始就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到一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用于指导革命救国斗争。此后,廖仲恺长期坚持宣传亨利·乔治关于土地国有的“单税社会主义”理论,并力图在建设民国之广东的施政过程中尝试实践它,以实现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纲领。这期间,他还不时表露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赞赏、肯定与向往之情,如在1906—1907年间,其在《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文章中曾简介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并在译文和按语里对马克思学说及其事业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和敬意。

在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特别是在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几年里,廖仲恺在摸索救国道路时重新审视国情,通过对中俄两国革命的反思与比较,与时俱进地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新探求,并在解释为何要“平均地权”时增加了重要的新内容。他将土地问题与社会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更强调“平均地权”旨在消除阶级剥削和改善人民生活,对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表示憎恶,对劳动群众的痛苦抱有深切的同情与责任感。他进而认为,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土地国有政策是解决土地和民生问题的办法,指出“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5]845}。正是基于此,廖晚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比孙中山更激进。他在1923年11月的一次国民党中央会上,表示赞同鲍罗廷关于“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的建议^{[7]41,44,46,51,62}。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廖仲恺在与共产党人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谋求中华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他指出:资本主义是私人经济社会,其“法律、政治、经济种种之制度,多半为拥护资产阶级而设……凡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生产越多,贫民愈众。这种怪现象就是国家社会的病症,资本制度的破绽,……阶级之争斗到底免不了。政治组织之经济基础,那就是从根本上动摇起来,非至崩坏不止”。而“社会主义的要点,是社会全体动员来做福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在

这种主义之下之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为消费而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4]240-241}。基于这一认识,廖的社会主义观开始由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转变,将其革命救国与振兴中华民族之望寄托于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最近代国家之政治组织……其中有两个不同主义给国民选择应用的:一个是资本主义,其他一个是社会主义”,“现今之青年学生,确有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将来之光就是在这一点”,“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所希望于研究社会主义一般青年的”^{[4]239-241}。要革命救国和振兴中华,就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廖仲恺所得出的答案,也是中国近代先进分子经过几代人摸索才找到的真理,廖仲恺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探索者之一。

总之,廖仲恺的一生是革命爱国者的一生,爱国爱民是他最具特色和魅力的政治品格,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与主线。他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生对祖国执著的深厚思想感情,而且更表现在其毕生始终不懈的救国建国之实际行动上。廖的爱国思想与践行,永远同其关心祖国、热爱祖国、拯救祖国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他实践爱国主义的最高行动准则是毕生献身于祖国,坚持革命救国与努力振兴中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始终怀着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在坎坷而漫长的革命救国征途上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和实践,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爱国主义仍是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和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弘扬爱国精神仍是一个永恒而又常讲常新的时代主题。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将它列为第一条。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振兴中华民族和完成祖国统一等事业,仍需要不断地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因此,廖先生遗留给我们的堪称为中华民族国魂的这种爱国主义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二 近代化思想是廖仲恺精神遗产的闪光内容,值得借鉴发展

廖仲恺的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闪烁着学识智慧的光芒。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主攻政治经

经济学专科,对经济理论颇有研究。辛亥革命后,他追随孙中山左右,领导与从事财政经济工作达十几年之久。廖仲恺在为革命当家理财、筹措经费和建设民国等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从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套强国富民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主张。他作为民生主义的宣传者和实践家,始终认为在振兴中国实业、发展社会经济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应实现孙中山关于社会文明福祉让国民平等以享之的社会革命目标,以改善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其实现途径有二:一是以“平均地权”办法来解决土地国有问题,二是以发展消费合作社来解决人们财产不均问题。而他对于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当时国情的深刻分析,及关于如何进行国家近代化经济建设的卓越见解,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廖仲恺在论及中国近代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首先,在探索建设富强国家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发展实业和摆脱贫困落后,根本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消除政治障碍物,以民主革命之胜利来为近代化经济建设扫清道路。他在列举了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一起压迫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罪行后指出,若“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这是一定的道理”^{[4]223}。“所以为今之计,应该合全体国民的力,共谋政治上的改革,以致能够自由发展我国的实业而后可”^{[4]228}。他形象地比喻说,这些年我国“在经济上、商业上和别国国民赛跑”,“眼望着别国国民一站一站的接近那世界进步的目标去了,我们依然在那同一线同一点上,争个脱身也争不动”,是我们“没有把赛跑的障碍物除去之过”,“这些政治上的障碍不除,经济、商业是绝不能进步”的。因此,我国若要发展“大计划的工商业……必须先从本源着手,把政治上的障碍物扫清,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第一着。这第一着做到,我们国民便可以向着世界进步的目标,按照我们的心算大踏步赶上”^{[5]347-349}。廖仲恺在这里所说的“谋政治上的改革”和“扫清政治上的障碍”,具体而言就是要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势力,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以民主革命为经济近代化建设开路。他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如“不从政治上求解脱,打开一条生路,必致败亡而后止,这是一定的趋

势”^{[4]228}。不解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桎梏,“则中国产业界上无论有甚么高深学问的人才,化学、工业、矿学等等研究无论那样精深,资本无论那样巨大,皆不能有所作为”^{[4]224}。他一再强调:“国民革命不成功,则实业之发展绝无希望”,因此,“我们一定要革命,把目前的不良制度推翻”^{[4]116,224,193}。在这里,廖仲恺将国家的贫穷落后这一经济现象,同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得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贫弱和痛苦之根源的正确结论。鉴于此,他认定要振兴中国实业必须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解决好这一政治问题是发展国民经济、进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前提。这表明他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把握了当时的实际国情,在中国何时才能着手进行近代化建设的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

其次,廖仲恺在谈到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的具体设想与规划时,突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廖仲恺十分重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建设富强国家中的作用,强调应注重“刺激生产的原动力”,即发展生产力和改进生产方法。他指出,欧美各国在工业革命后,生产事业蒸蒸日上,其“产业革命的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生产方法的改革”。“中国社会现状无一非贫乏之症,欲救贫乏自非改良生产方法不可。今之所谓利用机器,扩张工场,振兴实业,皆图所以解决此生产问题,以致富裕”^{[4]219,284}。显然,他将发展生产力——采用机器生产、学习西方的科技与管理、进行扩大再生产等,看作是使中国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途径。第二,廖仲恺发挥了孙中山关于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的思想,提出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特别是修筑铁路。他指出:中国地广人多,在建设中国时要想发挥这两个要素的作用,“第一要紧的,就是全国的交通机关非改良不可;这交通机关,第一要紧的就是铁路”,“进步、发达这两句话……未有铁路是不行的”^{[4]17-18,20-21}。他强调发展交通建设事业的好处至少有三点,即有利于开发祖国各地的富源,有利于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有利于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这些对于国家的近代化经济建设都有帮助、促进和推动作用。第三,廖仲恺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近代化的商品生产和活跃国内商品经济。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

应让“从前压死了的民生商业,要它热腾腾地发达”起来;就应学习欧美国家,“用近代生产的组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自家造东西”;利用我国充裕的劳力、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展以“多用原料、多造、多卖”为主的商品生产,来“和外国的商品竞争”^{[4]17,19}。为加快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廖仲恺还提出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组织近代化、专业化的生产,依托国内市场,并进而开拓国际市场,及改革紊乱的中国货币,将币制革命与经济革命一举而完成等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正确经济主张。

应该说,廖仲恺所规划的中国在独立前提下发展近代化国民经济的方案,是符合当时我国国情的。众所周知,机械化生产和交通设施等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发达不可少的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也是近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廖仲恺把采用机器生产、发展交通事业和商品经济等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这无疑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民经济走向近代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廖仲恺的这些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尽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但它的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而言,含有三大思想亮点。

反对列强侵略和主张自主图强,是廖仲恺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的亮点之一。自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东方列强以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打败了清王朝,并迫使其签定不少出卖国家主权和政治经济权益的条约。各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作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以保障他们产业的发达,使生产的盈余得以尽销于中国”^{[4]224},从而使中国逐步沦为为其经济附庸。廖仲恺对此感到既愤慨又痛心。他一方面指出必须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之工商政策,就是不学他这主义,要抵抗这主义的侵略”^{[4]29},并强调我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保护关税和金融,要像“保存国民永远的命脉”一样,来“保存有限的资源”^{[5]351}等。另一方面,廖又号召并勉励国民一定要发愤图强,发展生产力,振兴中国的实业,迎头赶上欧美各国。他说:“我人苟不力图自振,则此后之被压迫、受痛苦,将犹无止期也”^{[4]193}。他认为,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

经济掠夺,努力去建设一个富强的近代化中国,这是历史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为广民众谋幸福生活,是廖仲恺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的亮点之二。他将发展近代中国经济,同改善国民的生活联系起来,表现出其经济建设思想具有为民爱民的特色。廖始终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最后目标是“使中国人民得世界人类平等之幸福”与“人类上应有享受之幸福”,我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是“欲解决国人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是“为群众谋幸福”^{[4]238,194,165}。他强调:我们“救中国,应先救中国的穷……救中国人民的痛苦”,“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救我国“民穷财尽”的良方^[8]。由此可见,廖仲恺始终将改变祖国的贫弱状况与解除民众痛苦之事放在心上,时刻把建设好祖国同富民爱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执著地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正是他搞好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

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外延,是廖仲恺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的亮点之三。他在论述发展中国经济、强国富民问题时,总是将中国的振兴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强调中华民族应“自救以救世界人类”^{[5]351},对全世界人民多做贡献。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谈论强国富民和近代化建设者虽多,但强调中国富强后应对世界人类多作贡献者则仅廖君一人。他指出:“世界上独立的国民,总以中国的国民为最多;世界上相连的领土,总以中国的领土为最阔;世界上未开的财源,总以中国的财源为最富。对于世界有最大贡献的就是中国。”^{[5]350}他常以中国建成近代化富强国家能对世界人类产生积极影响与多作贡献,来激励国民努力去振兴经济与增强国力。他强调中国能否建设成功是关乎世界人类福祸的大事,“我们国家建设不成功,就可以累到全世界纷乱;我们建设能成功,就可以增加全人类幸福。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世界人类的义务”^{[5]352}。廖仲恺的这些话,既表现出他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又表现了其胸怀全球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还认为,中国现实的处境与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我们只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经济腾飞,才能造福于国民和全人类,才算尽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廖有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近代化经济大国的思

想,而无中国将称霸世界之意,我们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两者的统一。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的梦寐追求。这项工程需要许多代人相继地不懈努力才能完成。廖先生在这方面不仅以毕生奋斗努力作出了贡献,而且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以借鉴和发展的思想遗产。他关于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要反对外国的侵略与干涉,要自主创新地努力发展与提高生产力,要搞好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活跃市场经济等主张,对我们今天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共同富裕的小康和谐社会,仍有参照、借鉴作用。

三 勤政廉洁是廖仲恺精神遗产的风范之处,可为后人楷模

廖仲恺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实干家。其夫人何香凝曾强调说:我们“纪念廖先生,第一不要忽略廖先生的实干精神”^[9]。可以说,做事认真负责和沉毅果敢,工作勤奋和精益求精,及坚持在理财中精打细算与廉洁奉公等等,是廖仲恺一贯的思想与工作作风。有人评价说:廖先生“一生功夫,差不多都消磨于革命工作上……不尚空谈,专注实际;……他的为人处事是廉洁、仁慈、勤奋,绝非一般做官发财者所能与之比肩的”^{[1]43-44}。的确,廖的这些优良品质,成为他深受孙中山信赖与器重的重要原因。何香凝指出:“因廖先生忠贞、勤奋、廉洁、沉毅、果敢,而又精于英文,特别受孙先生的信任”,孙晚年“总是听取他的意见,处处要他帮助”^[9]。

工作不避劳怨、不计名利、勤政为民,是廖仲恺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之一。1909年6月,32岁的廖仲恺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归国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中法政科举人,旋被派往吉林边务督办、巡抚陈昭常署中任译员,从而开始其从政生涯。这期间,他曾协助陈等与日方办理延吉边务交涉事宜,尽力尤多。而他真正为民执政乃始于辛亥革命高潮中的广东军政府时期。在1911年11月至1913年8月间,廖仲恺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参议、财政部副部长(副司长)、财政司长、广东国税厅厅长等职。这期间,他在粤督胡汉民手下积极忘我地工作,“常入都督府议事,至深夜而出”^{[10]212}。廖在任内殚精竭虑,多方设法,为广东共和政府财政的恢复、稳定和发展及新生政权的

巩固,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后来,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讨袁护法斗争、捍卫民国共和制度的艰苦岁月里,曾多次身膺党和政府的党务、宣传,尤其是理财等重任。他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努力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了筹措军政费用,廖在财政部长任上被迫发行销售公债券以集巨款。他在此项工作中对于各地债券销售数目的报告、债票号码的呈报及其存根的缴交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相应的规定,并亲自抓好此事。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细勤勉作风获得后人的赞颂。有人指出:廖多年“全权管理党的财务,……没有一笔不清楚的帐目,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条的支款”^{[11]32}。他如此的勤政负责,实在难能可贵!

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廖仲恺更勤奋地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他当时先后担任过近20个党政军方面的主要职务,经常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尤其在筹办黄埔军校及孙中山病逝后的日子里,他可谓是日理万机,常常废寝忘食地进行工作。据何香凝忆述,廖往往一大早起来就忙公务,直忙到“快九点了……还没有吃早餐”,“午饭到下午二、三时才吃”,“每晚回来都在两、三点钟”,有时甚至“到四点钟才回家”^{[5]949,237,365,367},其工作的繁忙与辛劳可想而知。周恩来在廖被刺殉难后曾评价说:他是“热心作事者……最能负责、最能工作之领袖”,“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12]29}。何香凝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写道:“廖先生当时站在主导地位,也是我们同志中最努力的一个”,“自从孙先生逝世,仲恺更领着同志群众加倍努力工作,弄得眠食失常,真可以说是拼着命干”^{[5]235,946}。

廖仲恺这种拼命干的忘我工作作风,来自于他对中国民主革命救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他生前曾对夫人何香凝说:“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9]其勤政爱民的思想作风,为当时及后来的一切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这一高风亮节将永昭千秋。

廖仲恺大半生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理财,先后担任过十七八个省级以上的财政领导职务。他认识到,“贪”、“利”二字是为官理财的两大祸根,因此始终坚持廉洁自律、不贪私财。廖执掌财权十几年,始终两袖清风,一直过着艰苦的清贫生活,廉正是他的

又一高贵品质和思想作风。在广东军政府的财政司长任上,他署中无一私人,收受无一私财;他始终严格财经制度和纪律,尽力防止司内职员舞弊渔利。财政司职员后来在忆及廖司长的工作时说:我们任职财政部门十余年,“所见长官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1]12},这是对一位理财清官廉洁精干作风的称颂。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后,廖仲恺随孙中山亡命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不久后,他于1915年2月出任党的财政部副部长,并代理部务一年多,积极筹集经费支援孙先生组建中华革命军,开展讨袁护国的军事与政治斗争。1917年7月,孙中山由沪南返广州护法时,廖力主代孙向德国富商哈同借款近140万元^{[5](121)},从而保证了拥孙的议员及海军舰队得以南下广东护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廖又于9月底受命出任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并代行部长职权(因唐绍仪未到部长任)。这期间,他向海外侨胞广为筹款,并力争盐税收入和大力发行推销军事内国公债券,共支付近420万元,用以支持护法军北伐及援助陈炯明之粤军向汕头、闽南发展。1919年,廖在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财政部长后,又千方百计筹款接济陈炯明、许崇智的援闽粤军,帮助其发展壮大实力。长期以来,凡是经手的每一宗、每一笔款项,点滴收入都归公款,私自不曾动用分文。廖以其廉洁品质与理财能力,赢得了孙中山的倚重和全党同志的好评,人们赠给他一个雅号:“孙中山的荷包”。

在孙中山1921年再度开府广州、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广州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他任职伊始,即订出整顿广东财政计划书,并发布整顿财政令,纠正以往桂系治粤时数年不造缴计算书和领款后不办报帐之弊病。他以身作则,严格财经制度,厉行整伤广东的财政金融,要求各党政部门应恪守定章办理,以循法规。这期间,廖经手的款项数以千万计,而其家室仍然是生活俭朴清贫。他领导的省财厅积极为孙中山出师讨桂和举兵北伐筹措饷款,先拨出800万元作为讨桂军费,后又拨款300万元(还有说是200万元)供北伐军出师费用^{[13]237},这招致了反对北伐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陆军部长陈炯明的忌恨。1922年6月14日,陈诱禁廖于石井兵工厂内,派一营兵力看守,并说我已将孙的荷包锁住了,看他还怎么北伐?此消

息传出后,何香凝冒死上白云山见陈炯明,要求释放丈夫。“扣廖”事件惊动了不少人,法政专科学校的陈公博得此消息也心急如焚。他不是廖的好友,仅与廖见过面而未交谈过一言,他如此焦急是因被廖的廉洁所感动——原来陈从各方面得知廖先生他非常廉洁,他觉得在叔季之世而有这样一个干净之人十分难得,对廖受到伤害不由得感到心急。他当时不识陈炯明,无缘直接去求情,只好转托法专校长金章恳求陈炯明放了廖先生,要其不要伤害了这样一位清官好人^{[6]175-17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廖仲恺的廉正品质和人格力量感人至深!

在实行首次国共合作的两三年内,廖仲恺先后担任了统一广东财政委员、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筹饷局总办、大本营财政委员会委员及主席、中央银行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实业投资委员会委员等财政部门的领导职务,他担任的广东省长和军校党代表也兼有理财之职能。廖在位期间,努力调查各行业的税情,饬令遵章征收批解;严格考成各县长征收钱粮税款之成绩,对渎职者严惩不贷;发布统一广东财政通电,要求各军将截留的税款统交省财政厅核收,并规定各县之钱粮等款归县长征收,军人不得干扰;他厉行禁烟禁赌,以发行短期债券及开辟税源等办法来平衡财政收支。总之,廖在统一全省财政的过程中雷厉风行,不讲情面,软硬不吃。这使一班武人、政客和右派官僚们无计可施,他们看到廖既恐吓不倒又收买不成,为保住滚滚财源,最后下毒手刺杀了廖先生。何香凝在论及丈夫的死因时指出:先生“主张统一军政财政……坚持禁烟禁赌,大招贪官污吏、不法军人及反动派之忌,而有谋杀廖仲恺同志之举”^{[5]69-70}。显然,廖在统一财政方面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是其被害殉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廖先生疾贪如仇和廉洁奉公,损害了一些人的非法权益,因而引起他们的忌恨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晚年位高权重的廖仲恺依然为官极为廉正!

廖仲恺的勤政廉洁品质,来自于他的执政为民思想和克己奉公精神。他生前常说:“为官不能爱钱,爱钱则民穷,民穷则国弱。”^[14]基于此,他毕生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奉为准则,并始终以廉正来律己律人,堪称是一代楷模和后人榜样。他的这一高尚品质,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八荣八耻”社会

主义荣辱观值得借鉴与发扬的思想财富。在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的今天,廖先生的勤勉廉正践行,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现实意义。

总之,廖仲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今天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首要内容,它光照千秋,应予继承弘扬;其近代化经济建设思想中的真知灼见,很值得借鉴与发挥;其勤政廉洁之高尚品质可为后世榜样,也是今

天构成社会主义荣辱观值得借鉴汲收的重要内容。这些精神遗产,是他留给中华民族子孙的宝贵政治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的小康社会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廖先生殉难周年纪念刊[J].广州,1926.
- [2]程途.廖仲恺[M].上海:正中书店,1936.
- [3]王绍子.革命先烈传记[M].上海:经纬书局,1936.
- [4]廖仲恺集[M].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尚明轩,等.双清文集: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 [7](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8]孙总理逝世后之哀悼集会[J].党声周刊(广州),(59).1925-04-13.
- [9]何香凝.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身殉革命记[J].宇宙风,(47).1937-08-16.
- [10]丘政权,等.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11]何伯言.朱执信,廖仲恺[M].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
- [12]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廖仲恺先生哀思录[M].广州,1925.
- [13]周兴梁.国民革命与统一建设[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14]廖梦醒.缅怀遗爱话当年[J].大众电影(北京),1983,(10).

Principal Intension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Liao Zhongkai Spiritual Heritage

ZHOU Xing-liang

(History Department,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Liao Zhongkai leaves much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for our benefit. The spiritual heritage left by him covers the rich contents of patriotism, modern economic construction ideas and lofty moralities of diligence in government affairs, honesty and integrity. It is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 today to learn from, inherit and uphold it.

Key words: Liao Zhongkai; spiritual heritage; intension; realistic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凌兴珍]